
盛唐地方官吏中的诗人

丁 放 袁行霈

内容提要 本文将地方官吏中的诗人分为三小类，即由朝廷贬至地方的诗人、一生主要在地方任职的诗人、游宦于节度使幕府中的诗人。第一小类诗人由台阁走向社会，仕途受挫，反而为诗歌创作带来新的活力，作品得江山之助，面目一新。第二小类诗人多为出身寒微、进士及第而入仕的文人，官职卑微，生活阅历丰富，作品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艺术水平较高，诗歌主要抒发不遇之悲、薄宦之悲，写田园隐逸之情、山水风物，还有借情词抒怀一类的诗作，他们人数众多，每人存诗虽不多，但往往有名篇佳作传世。第三小类诗人用诗歌描写边塞风光、吟咏将士的喜怒哀乐，表现军中的不平，为诗坛带来奇光异彩。总之，地方官吏中的诗人仕途不顺，刺激了诗歌创作，其艺术水准明显高于宫廷中的盛唐诗人。

关键词 地方官诗人 诗人身份 贬官 游宦 幕府诗人

盛唐诗人可以以其身份地位、主要生活经历来分类，这是我们提出的一种新的分类法，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将盛唐诗人分为三大类，即宫廷中的诗人、在地方与幕府任职的诗人、在野诗人。本文即以第二大类诗人为中心展开论述。这一类诗人又包括三小类，一是由朝官贬至地方的诗人，二是平生主要在地方为官的诗人，三是游宦于各节度使幕府的诗人。

一

第一小类诗人多曾在朝任高官，有些人还当过宰相，因故被贬至地方任职，政治环境的变化给诗歌创作带来极大的影响，主要有张说、张九龄、李邕、房琯等人。

张说（667—730）是因贬官而诗歌创作获得丰收的典型。开元元年（713）九月，张说因支持玄宗铲除太平公主有功，入朝任中书令，年底即因与姚崇有隙，贬授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三年四月，又左迁岳州刺史。贬官相、岳二州，是其诗风转变的关键期和创作的高潮期。《新唐书·张说传》曰：“既谪岳阳，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所论极确。

张说谪居相州时的诗不多，但诗风已转为平易，可视为岳州诗的前奏。其《相州九日城北亭子》、《相州前池别许郑二判官景先神力》、《相州山池作》、《相州北亭》，皆为山水诗，语言流畅，技巧纯熟，在吟咏山川的同时，偶尔发年华老大之慨。《相州冬日早衙》则写自己勤于王事、克尽职守及岁月蹉跎之感。作于相州的《邺都引》是张说诗中难得一见的佳作：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这首诗文词朴直，格调高远，感慨万端，与初唐四杰诸人以“流丽”取胜的七古相比，已有较大进步，《唐诗别裁集》评云：“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

张说的岳州诗现存五十余首，体裁齐备，题材则有游览、登临、山水、抒情、咏史、送别、赠答、宴饮等。这些诗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感情真挚，艺术感染力较强。他是玄宗政变的大功臣，现在无辜遭贬，其内心必然充满牢骚与不平。其诗多抒发恋阙之情与叹老嗟卑之意，而这二者又有逻辑联系。如“正在江潭月，徘徊恋九华”（《岳州作》）、“离魂似征帆，恒往帝乡飞”（《岳州别赵国公王十一琚入朝》），偏重于写恋阙之心。“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岳州宴别潭州王熊二首》）、“宁思江上老，岁晏独无成”（《岳州赠广平公宋大夫》），则以叹老嗟卑为主。有时二者交织在一起，如《岳州九日宴道观西阁》：“摇落长年叹，蹉跎远宦心。北风嘶代马，南浦宿阳禽。佳此黄花酌，酣余白首吟。”这些诗较为真实地写出被贬谪岳州时的失意之情和年华老大、无所作为之悲。不过，张说被贬，过非由己，故内心坦荡，他与玄宗关系极深，对前途并未绝望，其岳州诗亦非全为“凄婉”之什，其写山水、友谊、风土人情等，均有乐观开朗之作。如七律《灕湖山寺》，《唐诗援》即评云：“此燕公初谪宦时作，绝无怨尤之意，而和平恬澹如此，可觐公之器量。”他曾与赵冬曦、尹懋及张均（张说长子）游赏湖山，留下一批山水佳作，如《游洞庭湖湘》、《出湖寄赵冬曦》、《岳阳早霁南楼》、《同赵侍御乾湖作》、《和尹懋秋夜游灕湖》、《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游灕湖上寺》、《岳州宴姚绍之》、《别灕湖》、《岳州观竞渡》、《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等。

其名作《五君咏》亦作于岳州，分咏魏元忠、苏瓌、李峤、郭元振、赵彦昭五位过世不久的名臣，能用极其简略的笔墨，写出各人的生平大节。他与诸人均有很深的交情，魏、李、郭三人还曾得到张说的救护，张说曾为其中几位写过行状、墓志铭等，这组诗是诗的形式五人传记，同样不愧为“大手笔”。这组诗的创作，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唐人郑处海《明皇杂录》曰：“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辩才略，互相排摈。苏頲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瓌相善，说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頲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僚旧，頲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事，陈说忠贞谗谀，尝勤劳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①则这组诗实为政治诗。《五君咏》最早为颜延年所作，张说因袭其名而为之。张说咏魏元忠、郭元振、赵彦昭，赞其拥立玄宗之功；咏李峤，重在赞其诗才。他们均曾任宰相，多为立大功而不受重用之人，除了苏瓌之外，晚年均曾被贬，晚景凄凉，多与姚崇的打击压制有关，张说之诗，既是为五人鸣不平，也是为自己喊冤。张说写苏瓌，主要是想用旧情打动苏頲，因为苏瓌仕途颇顺，无晚年被贬之事。

赵冬曦和尹懋是张说在岳州时的朋友或部属，诗风也较为接近。赵冬曦（677—750），神龙中举进士，任校书郎，玄宗先天元年（712）制策登科，任右拾遗，迁监察御史，因罪流岳州，与张说、尹懋酬唱，其诗如《陪张燕公登南楼》：“抑郁何以欢，阴氛亦登望。孤岛轻雾里，行舟白波上。”《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群动皆熙熙，噫予独羈束。常钦才子意，忌鵬伤踳跼。雅尚骚人文，怀沙何迫促。未知二贤意，去矣从所欲。”尹懋《奉陪张燕公登南楼》：“君子每垂眷，江山共流眄。水远林外明，岩近雾中见。终日西北望，何处是京县。屡登高春台，徒使泪如霰。”看来不仅是张说，连其周围的赵、尹诸人之诗亦具“凄婉”之态。

张说被贬至相、岳二州，由台阁走向社会，由云端跌入凡尘，诗歌发生重大变化，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凄婉”，朝个性化方向进了一大步。这些“得江山助”的诗作，以泛咏山水加送别，同时抒发牢骚不平，艺术水平虽未臻盛唐一流境界，但创作时间比张九龄、王维同类诗要早，有一定先导作用。《邺都引》，语气雄壮，情辞慷慨，有为盛唐边塞诗开风气的作用，对高适、岑参诸人有一定影响。《五君咏》是一组与当时朝政有重大关系的诗；它上承颜延年《五君咏》，下开高适《三君咏》、杜甫《八哀诗》，具有诗史性质。其《杂诗四首》上承阮籍《咏怀》、陶渊明《杂诗》，下启张九龄《感遇》、李白《古风》，

① 郑处海《明皇杂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63页。

均不愧名作。此时初唐诗人已经谢幕，盛唐诗人尚未成长起来，诗坛相对沉寂，故张说得以独领风骚。

张九龄（678—740）既是张说文化事业的接班人，又是张说之后的诗坛盟主。前人常将他与张说相提并论，胡应麟《诗薮》云：“二张五言律，大概相似。于沈、宋、陈、杜景物藻绘中，稍加以情致，剂以清空。学者间参，则无冗杂之嫌，有隽永之味。”^①实际上，张九龄诗歌的艺术水平高于张说，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张曲江体”，他的代表作也主要产生于被贬出朝期间。

张九龄诗多寄兴深远之作。清人施补华《岷佣说诗》云：“唐初五言古，犹沿六朝绮靡之习，唯陈子昂、张九龄直接汉、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复古之功大矣。”^②他作于被贬至洪州、桂州（开元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和荆州（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期间的政治感遇诗，多用美人香草之法，表现自己高尚的操守、不肯同流合污的品格，如《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咏史》、《荆州作》二首、《在郡秋怀》二首以及《咏燕》、《庭梅咏》、《听筝》等咏物诗。如《感遇》（其一）“兰叶春葳蕤”，《唐诗绪笺》曰：“此诗气高而不怒。”《感遇》（其十）写仕途失意之悲，怨而不怒，有阮籍《咏怀》风味。《杂诗》五首，向来被视为张九龄的代表作，熊飞《张九龄集校注》认为当作于洪州时期，有理。《荆州作二首》最能体现其晚年心态，二诗都是先对皇帝用自己为相表示感激涕零，又说自己既无后台，又不会钻营，故难免被贬出朝：“进士苟非党，免相安得群。众口金可铄，孤心丝共焚。”（其一）“谁谓诚不尽，知穷力亦殫。虽至负乘寇，初无挟术钻。”（其二）可见他为相时的艰难处境。诗人一则表明其操守：“高秩向所忝，于义如浮云。”（其一）过去虽至高位，但孔夫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古训还是牢记在心的。同时也表现了此时的恐惧心理与担忧心态：“胡为复惕息，伤鸟畏虚弹。”（其二）联想到九龄《归燕》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之句，说明其忧虑是一贯的，一代直臣失势后如此忧谗畏讥，着实令人叹息。这类诗是张九龄诗中最优秀的部分。《唐诗品汇》评云：“张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淡，体合风骚，赅赅乎盛唐矣。”^③

张九龄《感遇》、《杂诗》、《咏史》诸作，上继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下开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先河，值得重视。

张九龄的山水诗上继陶、谢，下开王、孟，也有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些诗也多作于任地方官期间。胡应麟《诗薮》云：“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④如：《郡舍南有园畦杂树聊以永日》：“为郡久无补，越乡空复深。苟能秉素节，安用叨华簪。却步园畦里，追吾野逸心。形骸拘俗吏，光景赖闲林。内讼诚知止，外言犹匪忱。成蹊谢李径，卫足感葵阴。荣达岂不伟，孤生非所任。江城何寂历，秋树亦萧森。下有北流水，上有南飞禽。我愿从归翼，无然坐自沉。”张九龄的一些羁旅行役之作也写得很有情调，《望月怀远》尤其脍炙人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诗是怀友还是爱情或是另有寄托，可酌。潘岳有类似的诗句，李白《把酒问月》、苏轼词《水调歌头·中秋》都有类似句子，这是盛唐第一流的作品，如有寄托，也是相当含蓄的；如无寄托，则是从汉乐府中演化而来的，是一首缠绵悱恻的爱情诗，与其《感遇》诗恰成对照。张九龄《感遇》组诗政治性强，人品志向好，艺术性不及《望月怀远》。与初唐诗人相比，张九龄诗个人抒情的成分明显增加，政治感遇之作也明显增多，艺术性较强，其代表作，多产生于被贬出朝期间。

李邕（675—747）字泰和，《文选》学家李善之子，少知名，武后时得李峤推荐，任左拾遗，开元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近体上·五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② 施补华《岷佣说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78页。

③ 高棅《唐诗品汇》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④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五言》，第35页。

初为户部郎中，中书令姚崇嫉其险躁，左迁括州司马，后来长期辗转各地任刺史，没能再回朝中任职，天宝六载，因故被李林甫杖杀。李邕好接纳文士，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今存诗十一首，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专咏之曰：“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风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锐。情穷造化理，学贯天人际。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

李邕颇有文才，又身为方面大员，在诗人中很有影响，李白、杜甫、高适都以与之结交为荣，杜甫夸耀自己早年有诗名，证据就是“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天宝四载，李邕与杜甫在历下（今山东济南）相会，各有诗作，高适有诗寄和。李邕有《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杜甫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高适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湖亭》。李白的《上李邕》，虽有自夸之嫌，但仍将李邕捧为孔子（宣父），诗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邕无辜被害，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将他与故相裴敦复并称，表达了深深的惋惜之情。李邕诗如《铜雀妓》：“西陵望何及，管弦徒在兹。谁言死者乐，但令生者悲。丈夫有余志，儿女焉足私。扰扰多俗情，投迹互相师。直节岂感激，荒淫乃凄其。颍水有许由，西山有伯夷。颂声何寥寥，唯闻铜雀诗。君举良未易，永为后代嗤。”对曹操在铜雀台蓄歌妓予以嘲讽，语意相当直率。

房琯（697—763），字次律，河南人，武后时宰相房融之子，少好学，以门荫补弘文生。好隐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献《封禅书》等，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同州冯翊尉。后任虢州卢氏县令，拜监察御史。复贬为县令。天宝初，任主客员外郎、主客郎中、试给事中。后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邺郡、扶风三太守，天宝末，拜左庶子，迁宪部侍郎。房琯存诗不多，《题汉州西湖》有清丽之致。他与诗人王维、綦毋潜、杜甫、贾至，音乐家董庭兰交往密切。

这一小类诗人的特点是仕途失意，诗歌得意，被贬到地方后，创作上面目一新。李邕、房琯在天宝时期的诗人群中有较高声望，为诗人提供了一些帮助。

二

第二小类诗人没有显赫的家世，多靠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但正因为缺少背景，他们中的多数人只做过县尉等微官，能当个县令就算不错了，这大体上就是他们初仕时的官职，他们一生在仕途上基本上没有进展，其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其中个别人也进过朝廷，但时间很短，官位较低，他们的身份主要是地方的微官、小吏，他们的诗歌也较多地带有中下层官员的色彩。因为他们的生活阅历丰富，游宦的地方较多，诗歌带有较多的生活气息。张子容、常建、王昌龄、崔曙、储光羲、李颀、祖咏、刘昶虚、阎防、薛据、王湾、卢僎、綦毋潜等属于这一类。

他们来自统治集团的下层，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心理状况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相对于宫廷中的诗人和身居高位的地方官诗人，这一批诗人诗作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加广阔，感情更为真挚，艺术水平更高，名篇佳作令人目不暇给。不过，这一批诗人所写的主要是自身的生活体验、喜怒哀乐，对社会民生和重大现实矛盾则较少反映，这也就是他们被称为名家而不是大家的原因之一。他们的诗主要表现以下主题：

1. 不遇之悲

他们虽通过科举正途入仕，但久居下位，官职卑微，所以慨叹仕途偃蹇的不遇之悲，就成为他们诗歌的最重要的主题。

《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评曰：“高才而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

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①将其与才高位卑的著名诗人刘桢、左思、鲍照相提并论，对其“沦于一尉”寄予无限的同情，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批诗人遭际的概括。此类诗如常建《送陆擢》：“圣代多才俊，陆生何考槃。南山高松树，不合空摧残。”綦毋潜《早发上东门》：“十五能行西入秦，三十无家作路人。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染洛阳尘。”祖咏《家园夜坐寄郭微》：“谁念穷居者，明时嗟陆沉。”这类牢骚，当然与他们曾仕薄宦，遭贬谪的经历有关。薛据《怀哉行》：“明时无废人，广厦无弃材。良工不我顾，有用宁自媒。怀策望君门，岁晏空迟回。……夫君何不遇，为泣黄金台。”首四句欲抑先扬，说有才者必有大用，实为自况。接下来的大段文字则是古今结合，写自己之不遇。薛据存诗虽不多，却多为精品，《河岳英灵集》评云：“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怨愤颇深。”^②强调的也是薛诗“自伤不早达”的“怨愤”之情。《河岳英灵集》评崔曙诗曰：“情兴悲凉，送别登楼，俱堪下泪。”^③如《送薛据之宋州》：“无媒嗟失路，有道亦乘流。客处不堪别，异乡应共愁。我生早孤贱，沦落居此州。”《登水门楼见亡友张贞期题望黄河作因以感兴》诗末云：“时与交友古，迹随山水幽。已孤苍生望，坐见黄河流。流落年将晚，悲凉物已秋。天高不可问，淹泣赴行舟。”都是写不遇之悲的。常建《落第长安》：“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自述本人落第之悲。綦毋潜《送章彝下第》、祖咏《送丘为下第》、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卢象《送綦毋潜》，都是同情友人下第的作品。

2. 薄宦（包括谪宦与游宦）之悲

这一批诗人中，有明确遭贬谪记录的人就有张子容、王昌龄、祖咏、阎防等人，张子容《贬乐城尉日作》云：“窜谪边穷海，川原近恶溪。有时闻虎啸，无夜不啼猿。”《永嘉作》云：“拙宦从江左，投荒更海边。”对自己被贬，十分不满，诗中所写的自然环境，正是其心情的折射。祖咏《长乐驿留别卢象裴总》：“故情君且足，谪宦我难任。直道皆如此，谁能泪满襟。”“谪宦”二字昭示了他的经历，“直道”二句则表现了他的愤懑之情。常建《鄂渚招王昌龄张偾》：“谪居未为叹，谗枉何由分。午日逐蛟龙，宜为吊冤文。”储光羲《贻袁三拾遗谪作》：“高帝黜儒生，文皇谪才子。朝廷非不盛，谴谪良难恃。”都对自己或朋友无辜被贬深感愤慨，对谪居生活均感苦不堪言。卢僎《初出京邑有怀旧林》：“世网余何触，天涯谪南蛮。回首思洛阳，喟然悲贞艰。旧林日夜远，孤云何时还。”也是写谪宦之悲的。

这方面诗作较多的是王昌龄，他有屡次遭贬的经历，故感触尤深。如《见谪至伊水》：“得罪由己招，本性易然诺。”《龙标野宴》：“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送薛大赴安陆》、《送吴十九往沅陵》、《送崔参军往龙溪》、《九江口作》、《留别伊阙张少府郭大都尉》、《岳阳别李十七越宾》都是写贬谪生活的。这些诗既有谪居的苦闷，又未对前程完全丧失信心。王湾《晚夏马嵬卿叔池亭即事寄京都一二知己》：“忝职畿甸淹，滥陪时俊后。才轻策疲劣，势薄常驱走。牵役劳风尘，秉心在岩薮。”做个微官，劳碌不堪，自然免不了牢骚满腹，想着林泉之乐。

李颀是写薄宦之悲的代表性诗人。写自己和友人的微官、薄宦、寸禄生活与不满情绪，是其诗的主旋律，这一点在盛唐诗人中十分显眼。其诗写隐居求道与念佛，也与仕途失意有密切关系。他的《放歌行答从弟墨卿》酣畅淋漓地体现了其遭遇与心情：“小来好文耻学武，世上功名不解取。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柏梁赋诗不及宴，长楸走马谁相数。敛迹俯眉心自甘，高歌击节声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空歌汉代萧相国，肯事霍家冯子都。徒尔当年声籍籍，滥作词林两京客。”《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老翁。男儿在世无产业，行子出门如转蓬。”

这一批诗人官职卑微，唐代官员一个任期一般只有三年，任满后或改任他职，或离职守选，故游

①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②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第166页。

③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第191页。

宦各地也是必然的。位卑禄薄又四处奔波，心情必然不会十分快乐。

3. 隐逸之情

一般来说，盛唐诗人都热衷仕进，甘心终生隐居田园的诗人并不多见（连著名隐逸诗人孟浩然也不例外），但一来客观现实使得他们经常不得不隐居（如入仕前、守选、丁忧、罢官等），二来隐居又有走“终南捷径”的可能，三来可以自命清高，所以他们热衷于作隐居诗。好在此时政治开明、经济繁荣，隐居时往往没有陶渊明那样的生计之忧，诗人们的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

常建《宿王昌龄隐居》：“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写得很美，有艳羡之情。祖咏《田家即事》写躬亲稼穡之乐，其《清明宴刘司勋刘郎中别业》云：“田家复近臣，行乐不违亲。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池照窗阴晚，杯香药味春。檐前花覆地，竹外鸟窥人。何必桃源里，深居作隐沦。”这首诗主要写山水幽情，有称赞吏隐之意。乔林《赠阎防》诗写阎防隐居礼佛，诗末“莫叹文明日，弥年从隐沦”，对阎防沉沦于盛世表示深切的同情与惋惜。阎防诗同样多写隐逸之情，如《晚秋石门礼拜》：“永欲卧丘壑，息心依梵筵。誓将历劫愿，无以物外牵。”

储光羲（706？—762？）是写山林隐逸之情的代表，也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于开元十四年进士及第，释褐冯翊佐官，后为安宜、下邳、汜水县尉，开元二十一年弃官还乡。天宝六、七载任太祝，后任监察御史，与孟浩然、王维、綦毋潜、丁仙芝等有交往。他初仕时作《赴冯翊作》：“本自江海人，且无寥廓志。大明耀天宇，霭霭风雨歇。迢递别荆吴，飘摇涉沂泗。广川俟舟楫，峻坂伤骐驎。蹭蹬失归道，崎岖从下位。”^①诗人及第后有官可做，照说是一件喜事，但他却并无欣喜之情，“本自”二句、“蹭蹬”二句，可见其心态，这种心态在盛唐初登进士第的诗人中是颇为少见的。开元十八年，他任安宜县尉时说：“小山宜大隐，要自望蓬莱。”明言自己在此任职只是一种隐居的方式。开元二十一年，作者辞官归隐，回到家乡，《游茅山五首》当作于此时。诗人认为自己十年求仕，得不偿失，本意在为国出力，没想到成了“空远游”（其一），于是决定回归田园，隐居求道：“家近华阳洞，早年深此情”（其二），“垂纶非钓国，好学异希颜。落日登高屿，悠然望远山”（其四）。

储光羲最优秀的诗当数隐居家乡及终南山期间所作的田园诗。前人常将储诗与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相比较，着眼点即在于田园诗。如《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其三云：“野老本贫贱，冒暑锄瓜田。一畦未及终，树下高枕眠。荷蓑者谁子，皤皤来息肩。不复间乡墟，相见但依然。腹中无一物，高话羲皇年。落日临层隅，逍遥望晴川。使妇提蚕筐，呼儿傍渔船。悠悠泛绿水，去摘浦中莲。莲花艳且美，使我不能还。”钟惺曰：“寄兴入想，皆高一层，厚一层，远一层，《田家》诸诗皆然。有此心手，方许拟陶，方许作王孟。”储光羲的《仲夏入园中东陂》、《山居贻裴十二迪》、《田家即事》、《题崔山人别业》、《贻阎处士防卜居终南》、《闲居》都是此类诗的优秀之作。其《效古二首》是盛唐少见的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值得注意。

4. 山水风物

盛唐这些诗人长期任职于地方，自然而然地接近山水，加上文人多性好自然，故这方面的诗既多且好，王维、孟浩然等山水田园诗人自不必说，地方官诗人也不乏佳作。如常建，《河岳英灵集》评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②是赞扬其山水诗。盛唐诗人写大海的作品不多，薛据的《西陵口观海》是其中非常出色的一首：“浙江漫汤汤，近海势弥广。在昔胚浑凝，融为百川长。地形失端倪，天色潜滉漾。东南际万里，极目远无象。山影

① 陈铁民先生《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载《文史》第十二辑）曰：此诗“是开元十四年作者在洛阳应试及第后初次授职时的作品。冯翊应当是作者释褐后的任所”。

②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第115页。

乍浮沉，潮波忽来往。孤帆或不见，棹歌犹想像。日暮长风起，客心空振荡。浦口霞未收，潭心月初上。林屿几遭回，亭皋时偃仰。岁晏访蓬莱，真游非外奖。”“地形”八句写出大海的气势，“日暮”八句写出作者的心情，均臻妙境。刘眘虚生卒年不详。开元二十一年（733）进士，后又中博学宏词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后来流落不偶。他的诗仅存十五首，《河岳英灵集》就选了十一首，其诗也多为山水清音。眘虚与并世名家多有交往，他有《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诗，孟浩然也有《九日于龙沙寄刘大眘虚》诗。他与高适、王昌龄、乔林、阎防也有交往。阎防诗仅存六首，《河岳英灵集》选五首，评云：“防为人好古博雅，其警策语多真素。至如‘荒庭何所有，老树半空腹’，又‘熊据庭中树，龙蒸栋里云’，皎然可信也。”^①所举诗例亦为山水名句。

5. 借情词抒怀

这一批诗人作了不少宫怨或闺怨诗，这些诗多为意在言外之作，主要表达自己遭受朝廷冷遇的不平。崔国辅《怨词二首》：“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其一）《长信草》：“长信宫草，年年愁处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丽人曲》：“红颜称绝代，欲并真无侣。独有镜中人，由来自相许。”《秦女卷衣》：“虽入秦帝宫，不上秦帝床。夜夜玉窗里，与他卷衣裳。”王昌龄显然是个中高手。其宫怨诗如《长信秋词》“金井梧桐秋叶黄”、“奉帚平明秋殿开”，《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秋怨》“芙蓉不及美人妆”，闺怨诗如《青楼怨》“香帙风动花入楼”等，也多与自己的坎坷经历有关，或者说是一种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写法。从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唐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张籍的《节妇吟》有言外之意，其实盛唐王昌龄等人的宫怨、闺怨诗也可从这个角度得一新解。

这一批诗人的共同特点是：一、存诗不多，但多为优秀之什（王昌龄、李颀、储光羲三人诗较多，水平也较高）；二、多为进士出身的文士，如张子容、刘眘虚、阎防、薛据、崔曙、包融、储光羲、丁仙芝、谈缜、申堂构、张晕等，文才出众；三、他们多无家族背景或政治背景，故多屈沉下僚，通常只担任过县令、县丞、县尉、主簿之类的“微官”；四、他们与盛唐著名诗人保持密切关系，有些还有很深的交情，诸人间的交往酬赠诗特别多；五、他们是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的有机组成部分，虽不如李、杜、王、孟、高、岑那样光芒四射，但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绿叶的扶持，盛唐诗坛未免显得有些寥落。这一批诗人多出寒门，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又恰逢盛世，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很高的期望值，可惜他们的政治理想并未实现，反而仕途蹉跎，潦倒终身，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缺少政治上的靠山，其次是他们的文才与吏干之间不能划等号，再次，他们的政治期望过高。简言之，一方面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并不可能真正重视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文士，另一方面，文士大夫们志大才疏，“沦落不偶”是他们必然的结局。他们诗歌的内容已如上述，在诗体上，王昌龄的七绝、储光羲的五言古诗、李颀的七言歌行，都达到盛唐诗歌的一流水平。

三

第三小类是游宦于各节度使幕中的诗人。他们多半是在军中任参军、掌书记，主要在河西、北庭、朔方、河东、幽州节度使幕任职。也有些人担任过朝臣或地方官，但对其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历是在节度使幕中的那一段。他们以诗歌描写边塞风光、吟唱将士的生活和感情，表现军中的不平，为诗坛带来奇异的色彩。据陈铁民先生统计，盛唐开元四年至天宝末年间有边塞诗传世的诗人共七十一位^②。《唐语林》卷八曰：“开元已前，诸节制并无宪官，自张守珪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

①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第203页。

② 陈铁民《关于文人入幕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先生还说：“边塞诗是指描写到塞外风光、军民生活和战争的诗（包括送人赴边诗），还有反映后方对边塞问题的关心和思念边防战士的诗。”本文论盛唐边塞诗，借鉴了陈先生的观点。

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至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唐音癸签》卷二七：“唐诗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而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之士，更多因缘幕府，摄级进身。”王之涣、王翰、崔颢、王昌龄、张谓、高适、岑参是这类诗人的代表。

王之涣（688—742）是盛唐较为年长的边塞诗人，他比高适大十余岁，比岑参长约二十岁，他何时到过边塞，史籍失载，现在只知道他曾任衡水主簿，被人诬告，辞官居家十五年，后调补文安县尉，天宝元年卒于任所^①。其诗仅存六首，但质量很高，如著名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送别》：“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还有一首《凉州词》也很有名，这首诗在当时盛传的情况，曾有过一个浪漫、动人的传说，见于晚唐人薛用弱的《集异记》。靳能《王之涣墓志铭》说其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白居易也记载郑畋与王昌龄、王之涣、崔国辅等人“联唱迭和，名动一时”^②，均可见当时盛况及王之涣的诗名。

王翰，景云元年（710）进士及第，曾在并州、汝州、仙州等地任职，他在当时文坛上名气很大，杜甫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将王翰与李邕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惜《王翰集》十卷已失传，我们无法见其作品之全貌。王翰存诗十六首，不仅有情调豪迈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③还有语气沉痛的乐府古诗《古长城吟》，而且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其警句云：“壮士挥戈回白日，单于溅血染朱轮。”

崔颢（704？—754），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开元中曾游江南，开元后期，得代州都督杜希望爱重，引至门下。天宝初，任太仆寺丞，后改为司勋员外郎，卒于天宝十三载。殷璠云：“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至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可与鲍照、江淹并驱也。”^④开元后期，崔颢来到代州杜希望幕府^⑤，从此诗风焕然一新。他描写边塞健儿的诗如《赠王威古》：“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秋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向寒泉。马上共倾酒，野中聊割鲜。相看未及醉，杂虏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尘高际天。长驱救东北，战解城亦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诗的前半部分写边将王威古的日常生活，写得虎虎有生气，后半写敌军入侵，将士慷慨赴敌，打败了敌人，保全了城池。这首诗写的是东北边塞的情形。《送单于裴都护赴西河》是一首送大将赴西北的名作，写得极有壮气。诗云：“征马出翩翩，秋城月正圆。单于莫近塞，都护欲临边。汉驿通烟火，胡沙乏井泉。功成须献捷，未必去经年。”方回《瀛奎律髓》曰：“盛唐人诗，师直为壮者乎？”^⑥崔颢有从军边塞的经历，他的边塞诗创作早于高适，比岑参同一题材的作品更早了许多年，其开创之功，值得注意。

王昌龄是盛唐较早、较长从事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在前人眼中，王昌龄以七绝知名，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曰：“七言绝句，王江宁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⑦当代学者，一是极力推崇其七绝，二是论其边塞诗时亦以七绝为主要对象，这种看法不够全面。岑参写边塞的五七言古诗也非常出色，

① 据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见《唐代墓志汇编》。

②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二《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2页。

③ 王世贞《艺苑卮言》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谓绝唱矣。惜为前二句所累，筋骨毕露，令人厌憎。‘葡萄美酒’一绝，便是无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尔。”

④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第161页。

⑤ 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时为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⑥ 方回撰、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7页。

⑦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〇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

如《塞下曲四首》中“蝉鸣桑林道”、“饮马渡寒水”等，即为五古，诗的重心亦在述边愁，当为其开元后期从军西北时所作，比高适《燕歌行》稍早。又如五古《代扶风主人答》，胡问涛、罗琴《王昌龄诗编年校注》编此诗于开元十三年底或十四年初，全诗格调凄楚，前人认为与杜甫的《三别》有相似之处：“‘三别’风骨于此再现。”（《批点唐诗正声》）其名句“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为殷璠《河岳英灵集》所称道。王昌龄的长篇七古《箜篌引》作于谪居龙标期间，诗人在龙标的卢溪遇到一位被贬谪的老将夜弹箜篌，叙说曾在蓟门立下大功，如今老病交加被发配边州，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是从旁人口中得知，老将虽是番人，却已五世归汉，部落强大，身经百战，不幸得罪了主将，落得九族分离、身为囚徒的下场。诗的后半部分是王昌龄自述，将自己比作谢安，希望皇帝能听他的计策，行怀柔之计，爱惜百姓，停止战争，使人民安居乐业。这首诗很有思想，可比王维的名作《老将行》。

王昌龄的诗与人，有以下几点与众不同，一是他的边塞诗创作持续时间长，从开元中期到天宝后期，有近三十年之久，可见他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二是其边塞诗的基调是不满与揭露，情绪以悲苦为主，这说明他虽身处盛世，却对唐王朝繁荣强盛表象下隐藏的深重危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其思想的深度与李白、杜甫天宝年间的边塞诗相近。过去一些学者根据其个别作品如《从军行七首》之“大漠风尘日色昏”等，强调其乐观豪迈之情，这是十分片面的；三是他两度被贬，长期任地方下层官吏，其诗有不少可归入第二小类。四是在盛唐名位不高的诗人中，王昌龄的交友圈子很广，其友人如綦毋潜、李颀、岑参、王维、李白、刘昫等，均为当时名手。五是王昌龄有诗歌理论名作《诗格》、《诗中密旨》，流传于中唐时，南宋以来，有人怀疑二书系伪托，但中唐时日人遍照金刚（空海）《献书表》即曾提及“《诗格》一卷”，空海《文镜秘府论》中尚存其文，此二书恐非全伪。

张谓（？—778），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排行十四。早年读书家山，博览群书，天宝二年进士及第，天宝末入封常清幕。《全唐诗》存诗四十首。《代北州老翁答》云：“负薪老翁往北州，北望乡关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两人已向黄沙死。如今少男新长成，明年闻道更征兵。定知此别必零落，不及相随同死生。尽将田宅借邻伍，且复伶俜去乡土。在生本求多子孙，及有谁知更辛苦。近传天子尊武臣，强兵直欲静胡尘。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明人唐汝询《唐诗解》曰：“此述负薪老翁之辞，以刺明皇之黷武也。”^①

当时最著名的军幕诗人是高适和岑参。

《河岳英灵集》曰：“（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②“多胸臆语”即直抒胸臆，真情流露，意胜于辞，不以辞采取胜，而以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感情吸引人。其诗披露胸襟，抒写怀抱，皆率直无隐，不假雕饰，用写实手法，不多作夸张、想象。多夹叙夹议，不常寓情于景，写景多大笔勾勒，偏主观感受，较少细致描写。其诗句经过提炼加工，有很强的感染力。“兼有气骨”即语言质朴有力，思想鲜明爽朗，与齐梁绮丽柔靡之作异趣，有刚健明朗的特色。其风格“尚质主理”（《吟谱》）、“浑朴老成”（《石洲诗话》）、“浑厚”（《诗薮》外编卷四）、“沉雄”（叶燮《原诗·外篇》）。这种风格的诗，是与他“拓落”、“不拘小节”的性格有密切关系的。

高适这些诗，主要作于边塞。他早年到过东北，后来又西北，对边疆生活有较深的体验，他“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旧唐书·高适传》），其边塞诗也多慷慨悲凉。开元二十年到二十二年之间北游燕赵，有《塞上》、《蓟门五首》、《赠别王十七管记》、《塞上听吹笛》、《营州歌》、《效古赠崔三》、《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等诗。其边塞诗的代表作《燕歌行》作于开元二十六年，《燕歌行》是乐府旧题，

① 唐汝询《唐诗解》，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页。

② 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河岳英灵集》，第152页。

高适沿用此题写时事，内容虽更为复杂，但是写征人久戍不归、关塞苦寒的基调并未发生变化。从作品的组织结构看，此诗从四面八方写来，却又集中到一点上，错综复杂，宾主分明。其中心内容是对边塞苦寒、战斗艰苦的描写和对将帅不得其人的愤慨，除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两句的强烈对比外，像“孤城落日斗兵稀”、“力尽关山未解围”，以及第三段的大部分描写，特别是具有点题作用的最后两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鲜明地表达了主题。《唐百家诗选》载赵熙批语称此诗为高适“第一大篇”，《网师园唐诗笺》曰：“沉痛语不堪多读。”

天宝年间，高适也有不少边塞诗佳作传世，如作于天宝九载的《使青夷军入居庸关三首》前人评为“雄浑悲慨，是盛唐人口吻”（《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又如《送李侍御赴安西》既写出离别之情，更勉励友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格调高扬，无悲凄之音。许学夷甚至欲取此诗为“盛唐五律第一”（《诗源辩体》卷一五）。《送浑将军出塞》为送大将浑瑊之出塞而作，作于天宝十二载前后。《唐贤三昧集笺注》评为“气格嵯峨”。本篇在高适以边塞生活为内容的送别诗中很有特色，它以诗笔写人物传记，记叙并歌颂了浑将军本为胡人，然英勇超群，文武兼备，于边塞数立军功，可比汉之名将李广、卫青（按：实应为霍去病，用典误），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唐百家诗选》载赵熙批语云：“浑将军得此一诗，胜于史篇一传。”确实，史诗互证，诗正可补唐史之阙。整首诗气势豪迈，语言质朴流畅，能代表高适边塞诗的风格特色。《塞下曲》作于哥舒翰幕府中，感情基调雄壮高亢，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情。首八句言威武之师出征场面，整装开拔，震天动地，军容严整有序。次四句言激战场面，重在氛围的烘托。“万里”四句言殊死战斗终以获胜归来，得到朝廷褒赏。末四句嘲笑治经学士们，皓首穷经，不切实用，碌碌以终。这里体现出唐代普遍的尚武风气，文人讲究实用，渴望立功边疆，而鄙弃做文弱书生，纷纷从军入幕，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边塞诗的繁荣。

高适的诗，在当世即享盛名，杜甫曰：“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奉简高三十五使君》）又曰：“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仅从其军幕诗来看，杜甫的评价并非过誉。

岑参（715—770）曾两次从军西北边陲，写下大量描写西北军旅生活和异域情调的作品，包括写战争、个人抱负、民族交往、奇异风光、边塞见闻、功名难得、思乡怀友等方面。《唐才子传》说：“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①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风会所感，豪杰挺生，遂不得不变出杜公矣。”^②岑参的边塞诗今存近百首，为唐代诗人之冠。其边塞诗名句：“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功名须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均为人所称道。

岑参的边塞诗以七言歌行最为出色。如作于天宝十三或十四载《轮台歌奉封大夫出师西征》，起首六句叙战争未爆发前的紧急形势，极尽渲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起语不凡，前人评“警湛”、“磊磊落落”（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上将”四句描写唐军出师的壮烈场面，表现出志在必得的气势；“虏塞”四句转写敌军实力的雄厚，及战场荒野、气候严寒，反衬战争的艰巨；最后四句预祝将士凯旋，兼有颂扬封常清本人之意。整首诗雄浑阔大，“语语壮健”，凡八次换韵，前七韵每二句一解，节拍甚紧，且平仄互用，后一韵四句，略舒其气，声调转悠。后人评价此诗“何减少陵”（《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网师园唐诗笺》评云：“逐句用韵，每三句一转，促节危弦，无诘屈聱牙之病，嘉州之所以颉颃李、杜，而超出于樊宗师、卢仝辈也。”方东树评此诗曰：“奇才奇气，风发云涌。”

①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3页。

② 翁方纲《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唐代天宝后期，朝廷对西北边疆保持着绝对的军事优势。在西北戍边的岑参，在诗中充分表现了国势浩浩的民族自豪感。岑参天性好奇，不自甘平庸，怀有一番轰轰烈烈地干事业的鸿愿，边塞既是建功立业的场所，又有多姿多彩的风光，恰恰能够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因而，他的诗不仅战争与奇异风光，就连日常生活在他的笔下，也写得十分新奇。而且，奇中又有壮的色彩。《火山云歌》就非常精彩：“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热海行》云：“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突波煎汉月。”毛先舒《诗辨坻》曰：“嘉州轮台诸作，奇姿杰出，而风骨浑劲，琢句用意，俱极精思，殆非子美、达夫所及。”^①再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既是实写，又象征着边防将士的精神面貌和深厚的友谊。岑参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更是以奇见长的杰作，此诗充分体现了“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语）的艺术特点。

高适、岑参是盛唐著名的军幕诗人，他们以军幕生活为中心创作的边塞诗，远轶六朝与初唐，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许学夷认为他们的“才力”超过王、孟，实际上，若仅论边塞诗的成就，应当说虽李、杜无以过之。高、岑二人的边塞诗也是同中有异的，其区别在于，岑重点在于描绘边塞风光、风土人情，高则重在写军队中的矛盾；岑诗色彩丰富，富有浪漫气息，高诗则有较深的社会意义，具有现实倾向。在体裁上，二人都擅长七言歌行。而岑诗奔腾跳跃，变化多端；高诗比较平直，以气势取胜。总之，二者的区别如《吟谱》所说：“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②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高适是理性为主的诗人，岑参是感性诗人。二人的共同风格是“悲壮”，但高适诗悲中有壮，以悲为主，较有思想深度；岑参诗壮中有悲，以壮为主，艺术感染力较强。他们的诗，都反映了边塞健儿的豪情，体现了盛唐气象。

四

本文论述盛唐时期担任地方官的诗人的创作，从人数上看，他们占了盛唐诗人的绝对多数，据我们粗略统计，盛唐诗人总数（指有诗传世者）约有二百五十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曾经担任过地方官，帝王及大臣诗人毕竟人数有限，真正的在野诗人（我们将另文论述）在盛唐也是少数派。对地方官诗人这一盛唐诗坛的主要群体，学界似乎多关注零散的名家名篇，很少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的工作就是对地方官诗人的总体研究。

地方官诗人与另两类诗人关系密切，可上可下，是一个并不稳定的群体，是联结另两类诗人的纽带，他们的身份又可能发生变化，如张说、崔颢、房琯等人后来又从地方回到朝廷任职。则他们在各类诗人互动过程中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如张说，由朝廷到地方任职，这种经历对其创作很有用，使其诗风发生了重大改变，后来他又回到朝廷，将地方清新的文风带到了中央。崔颢年轻时诗风浮艳，曾为李邕所斥，后来到了边塞，“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语），写了一批高质量的边塞诗，后来，他也回到朝中为官。张九龄贬官荆州后，不仅自己写出了一批好诗，而且有一批诗人与他唱和，如孟浩然有多首诗或上九龄，或和九龄；王维有诗寄给在荆州的九龄，宋鼎、钱起、王昌龄也有诗作，诗人裴迪也在九龄幕中，一时间，荆州诗坛应当是比较热闹的。又如李邕，天宝四载他与杜甫、李之芳等人的雅集，注定是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本年春，李邕自汲郡太守转北海太守，经齐州，与杜甫宴于古城李之芳所筑新亭，李邕、杜甫各有诗作，高适有寄和之作，

① 毛先舒《诗辨坻》，《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②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第48页。

李白的《上李邕》也作于稍后，不久，李邕与杜甫在青州又话旧论文，后来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记之甚详，可视为诗论史上有用的材料。而此事又发生在李白、杜甫、高适三人携手漫游梁宋期间，这就更有意思了。房琯在地方为官时，不但政治上有所作为，“所在为政，多兴利除害，缮理廨宇，颇著能名”（《旧唐书·房琯传》）。也与不少诗人有交往，孟浩然有《岷山饯房琯崔宗之》、陶翰有《寄房侍御》。房琯任宋城令时，与高适有诗唱和，天宝五载，李颀有《送綦毋三谒房给事》、《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此时房琯在朝任给事中，六载坐与李适之善，贬宜春太守。也是游走于两类诗人之间。正是由于这一类诗人的活动，才使得盛唐诗坛生机勃勃，异彩纷呈。这一类诗人是盛唐诗坛最为活跃的因子，他们之间交往多，交情深，唱和也多，与另两类诗人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翻一下吴汝煜先生的《唐五代诗人交往诗索引》，就可以看到张说、张九龄、王昌龄、高适、岑参、崔颢、房琯、张子容、李颀、崔国辅、储光羲、刘昶虚、阎防、李邕、薛据等人，都有不少写给朋友的诗，这些诗往往情真意切，真实地记录了诗人之间的交往，流露了诗人的喜怒哀乐，较少客套与掩饰，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此类诗人较为集中的活动，往往是在地方主官的倡导下进行的，如张说在岳州、张九龄在荆州、李邕在山东，周围都聚集了一批诗人，岑参的军幕诗也多为在高仙芝、封常清幕中的唱和之作。

盛唐任地方官的诗人，往往存诗不多，这可能与战争毁灭文化有一定关系。如李邕有集七十卷，王翰十卷，二人现存诗各仅有十几首，王之涣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现仅存六首，吕向的诗在当时很有名，现在连一首也没传下来。这显然与“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战乱的破坏有关，由此可以推断，盛唐诗人的不少诗作已经失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除了少数“幸存”的文集外^①，主要是《河岳英灵集》、《篋中集》、《国秀集》、《极玄集》等选本和当时的野史笔记所记载的作品，但就是这“一鳞半爪”，却也多为名篇，几乎每一位诗人都有杰作传世，王之涣、王湾、王翰、崔颢、祖咏等等都是存诗不多而有名篇传世的知名诗人。相比唐代其他时期，存诗少而名篇多，是盛唐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

本文所论述的任地方官的诗人，其仕途应当说是并不顺畅的，他们或由朝官贬为地方官，或浮沉州县，多为县尉、主簿之类比“七品芝麻官”还等而下之的微官，或因为在内地找不到出路而横戈塞外，诗歌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颇有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之意，但毕竟处在盛唐这样一个安定繁荣的大环境之中，此类诗人虽处境不佳，有牢骚不平，却仍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大唐帝国并未绝望，往往身处逆境而不气馁，屡战屡败仍奋进不止，盛唐诗人普遍较有政治品格，写理想的、发牢骚的作品不少，阿谀谄媚之作绝不多见，表现在诗中，就显得很有骨气，很有风神，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若与晚唐诗人相比较，这一点便可看得十分清楚。

（附注：本文由袁行霈提出题目和设想，丁放搜集资料撰写初稿，袁行霈补充修订）

〔作者简介〕

丁放，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发表过专著《金元词学研究》等。

袁行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陶渊明集笺注》等。

^①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王缙说王维之诗“天宝事后，十不存一”，韩愈《调张籍》说李、杜之诗“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盛唐存诗数在前三位的诗人尚且如此，其他诗人的作品恐怕留下来的就更少了。